

“十二个故事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过去的小说里面没有出现过的”

《晚熟的人》“新”在何处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本报实习生 王冉

在获得“诺奖”后，莫言能否续写辉煌，他将怎样开启下一步的创作，他是否能够突破可怕的“诺奖魔咒”？他的创作究竟有没有新的变化？获奖八年后的新作“新”在何处？莫言新作《晚熟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人们的这些疑问。

郑春，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代作家留学背景研究。近期，在“2022中国小说论坛”上，郑春同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王玉楼，就上述问题作出精彩讲解。

“十二个故事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过去的小说里面没有出现过的”

小说集《晚熟的人》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获颁“诺奖”的“我”重返故乡，见到老邻居蒋二借“我”获奖而大发利市，曾经的痴傻之人何以时来运转，成了风光无限的老板？蒋二自陈：“我们老蒋家的人有个特点，那就是：晚熟！当别人聪明伶俐时，我们又傻又呆；当别人心机用尽渐入颓境时，我们恰好灵魂开窍，过耳不忘、过目成诵、昏眼变明、秃头生发，我就是个例子”。

何谓“晚熟”，恐怕含义深刻很难说透。莫言给出了文本之外的答案：“希望能够不断地超越自己，而不要过早成熟、定型，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创造力保持得更长久一些”，这是否可以看作莫言创作《晚熟的人》的核心动机，或者是努力打破“诺奖魔咒”的一次有益尝试？

获奖八年后的新作“新”在何处，是否超越了此前的旧作，这恐怕是评论者无法绕开的话题。不过莫言坦陈“人物”是创作小说集《晚熟的人》的根本动机，并且着重强调新作的“新”，“十二个故事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过去的小说里面没有出现过的”。

比如《诗人金希普》中，展示的是一出当代社会的滑稽剧，一句“普希金之后最伟大的诗人：金希普”看似是对文艺圈子的诋毁，其实正是某些“评奖基本靠跑，宣传基

本靠吹”的文艺人士的真实写照。《表弟宁赛叶》通过“我”与表弟宁赛叶的对话塑造了一个不学无术却自命清高的人物形象。此外，《表弟宁赛叶》还隐藏着另一层文本内涵，“我”与表弟的争执，可以看作是莫言对获奖后受到恶意批评的反驳，两人的对话形成一种自导自演的“双簧戏”。“我”看似是在“恨铁不成钢”的愤懑中训斥表弟，其实攻击的焦点是表弟的文学能力以及表弟对作为文学家的“我”的污蔑。在这层意义上，《诗人金希普》与《表弟宁赛叶》体现着莫言对文坛众生——包括自己身为“作家”——的观察，呈现新作的现实批判向度。

《晚熟的人》中最具文学魅力的当是由旧时代走入新时代的人物，如覃桂英、谷文雨、蒋二、柳卫东等。这些拖着历史之影的人物在时代浪潮中起伏，历史的魅影与时代语境折射在这些人物的言行之中。如果“把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多部代表性的长篇连成一气，可以看到近百年中国历史变迁的风云变幻”，通过讲述“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宏大如挂毯的故事”，莫言在“正史”之侧构建了“传奇性”的民间野史。

此外，《晚熟的人》在新的历史高度和深度上，致力于为乡野人物立传。再度归乡是切入现实的一个切口，“莫言”进出于文本内外，揭示人物的成长经历，眼见之实勾连起喧哗的过往，在时间的河流中故乡人事得以浮出历史的地表，呈现为当下乡土风貌的一种缩影。

一种现象级的新围观

故乡、故乡的人、故乡的事，这种对于故乡的“三位一体”式的书写一直持续在莫言的文学创作中。从《白狗秋千架》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莫言或以寓言的方式展现中国百年历史，或以荒诞的想象书写乡土传奇，持续着对纸上原乡的史诗性建构，余占鳌式的草莽英雄，以上官鲁氏为代表的精神生命体在高粱如海的故乡原野上泼写自己的人生，展开一幅幅恢弘的中国画卷。《晚熟的人》所书写的“高密东北乡”则极为不同，有新的事物、新的人物，呈现一种走向商业化、现代化的中国乡村的缩影。在这种商业景观的形成中，作家的书写立场也呈现一种新的姿态。

在整个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围观是经常出现的场景，鲁迅与莫言无疑是围观书写的杰出代表。鲁迅以启蒙者的目光，在“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中审视冷漠的看客，揭示国民性中所缺乏的诚与爱，以引起疗救注

意。而莫言在《檀香刑》中借一次刑罚的实施，“在看客—被看者—掌控者等多元互动关系中，展现看客百姓的生存状态”，以感性生命力拯救只求“活命的民众”“种”的退化，这两种围观形成了一种“差异互补”。小说集《晚熟的人》所描写的围观场景呈现不同以往的新形态：一种现象级的新围观。

《红唇绿嘴》中，覃桂英一边高骂“这些该死的造谣分子”，一边依靠不断造谣获得高参的美名。她违法在前，却以弱者的身份赢得围观者同情心，倒逼政府满足自己的无理要求。这不禁让人质疑，那些所谓的弱者真的值得同情吗，他们到底是在争取社会的公平与和谐还是假借公平和谐的名义制造新的不公平。在当下的社会形态中，弱者似乎成为一种优势条件，卖惨、装穷似乎成为获取超额金钱与社会资源所必行的人设，以弱者之名行不公正之实，所谓“得网络者得天下”，不过是“得舆论者得天下”罢了。《红唇绿嘴》中对弱者的发现无疑是对当下社会症候的揭示与批判。

在《晚熟的人》中，莫言的新围观颠覆了围观的旧形式，展现出一种以操控者为主体的围观的新形式，通过商业活动中逐利的闹剧与伪装成弱者调动舆论力量获得非法利益的滑稽闹剧延伸到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思索。

《故乡》《边城》之外 还乡书写的新方式

还乡书写是乡土文学惯用的写作方式，游历远方的乡土之子以归来者的目光审视乡土，在现实与记忆的对立之中，乡土的变与不变跃然纸上。莫言也延续着这种乡村书写的方式，带着记者、教授、官员、军人等“成功者”的身份与对故乡的记忆闯入现实中的故乡，小说的冲突便在记忆中的故乡与当下的故乡、归来者与困守者的对话阻碍之间展开。

《晚熟的人》却不循此窠臼，它将此前宏大叙事所呈现的那种剑拔弩张的张力感打散在平顺和缓的叙事中，以民间之新人新事凑成故乡新的风貌。在风格上，小说集《晚熟的人》展现一种沉静质朴、张弛有度又不乏幽默气息的散文风味，给读者一种陌生和惊喜的阅读体验。如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所言，“莫言之前的写作是热闹、狂放、喧嚣的。迫不及待，有很多话要表达。但获得诺奖之后，他的写作出现了一个新的迹象，里面有一种平静感。他的写作，包括他看待世界与自我的方式，变得节制与平静。”

而这是否是对此前创作的超越，恐怕很难下定论。对于一个不愿重复自己的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不是在前一部的基础上继续堆砌新的高度，而是另起炉灶重新开张，他的文学世界不是一座不断增高的建筑，而是诸多建筑在文学原乡沃野上的建筑群。建筑与建筑之间固然有着高矮的差别，但更应该关注的是不同的建筑所体现的不同风格。

如果说曾经的“高密东北乡”，带着莫言对中国百年历史的深切体认，《晚熟的人》中的“高密东北乡”则因其即时性、批判性多了几分外在的审视，故乡不再是经由岁月的沉淀后从骨血里涌出，而是从现实经由妙笔移至纸上。

在以往的创作中，莫言多取材于童年的生活经历，当下的经历并未采用多少，与之相比《晚熟的人》无疑更多地采用了当下的经历。莫言在小说中刻意设置了大量的时间标志：“现在是在2017年8月1日，我在蓬莱八仙宾馆801房间”“这篇小说初稿写于2012年春天，五年过去了，那一年一届的乡乡会，已经成了历史记忆”。这些时间标志与作品的创作时间完全耦合，表示小说讲述之事发生的准确时间，同时呈现一种非虚构的特点，这无疑是对当下非虚构写作的一种呼应。

莫言此前的小说往往带有一定的传奇性。《红高粱》中的英雄好汉，《生死疲劳》中的六道轮回，而在《晚熟的人》中，莫言将传奇降格为日常，在现实中拼贴出当下乡土的原乡风景。故乡的人、事，好像一切都在改变，一切又都没有什么改变，一如那个“在变与不变中”继续讲述他的故事的莫言。

通读现当代文学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返乡主题的书写是中国现当代作家群体孜孜不倦的创作追求，主要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现实的返乡，如鲁迅的《故乡》、莫言的《白狗秋千架》，知识分子返乡所造成的内外空间的对峙几乎是这类返乡主题展开的固定逻辑；另一种则是带有哀婉的笔调为游荡城市的灵魂寻找一座安放心神的“希腊小庙”，如沈从文的《边城》。而在《晚熟的人》中，故乡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品格，它不再是作家的启蒙之所，也不再是安放记忆的精神原乡，它成为与作家并立的主体，展现了莫言乡土书写的一种新的面向，这就跳出了以往乡土书写中痛心批判和哀婉愁绪的无尽循环，用更为坦然和直白的方式展现现代乡土的真实形态，这种新的努力和追求是值得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的。



中文说唱回到地表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本报实习生 王冉

最近《中国说唱巅峰对决》的热播，让说唱再次回到大众视野。近年来，国内说唱节目喷涌而出，从开启潮流的《中国有嘻哈》，到关注社会议题的《说唱新世代》，再到今年重新燃起人们“集体记忆”的《中国说唱巅峰对决》，曾经一度处于地下的中文说唱，如今更多被主流接纳，其从小众走向大众的过程，也是从外来到本土的过程。

从根源上讲，说唱是个舶来品，最初是美国黑人群体的一种街头文化艺术。从20世纪80年代传入国内后，说唱相当一段时间基本处于野生的地下状态。《中国有嘻哈》掀起了国内第一股说唱热潮，将说唱这种艺术带到了地上，但其原生的外来特征也令不少观众遭遇文化冲击。其中颇引人争议的就是说唱的diss文化，似乎只要看不顺眼就“怼天怼地”，当时就有不少声音认为《中国有嘻哈》中的说唱不过是“伪嘻哈”，是对欧美说唱文化的生硬模仿。

如今，在《中国说唱巅峰对决》的舞台

上，说唱的样貌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如果说先前说唱文化的猎奇和刺激戳中了人们的兴奋点，而后来渐趋成熟的说唱正在去掉“戾气”，在这片土地共鸣、碰撞、摩擦生出新的火花的说唱文化，变成了一种警惕又客观、直接且简单的处世态度。

根据《网易云中文说唱音乐报告(2022)》显示，在歌曲内容议题层面，“金钱、豪车”的存在感明显下降，相关内容的歌曲数量由2016年的10%下降至2021年的3%。与此同时，讨论环境保护、女性、抑郁症、校园霸凌等话题的歌曲数量攀升。在2016-2021年间，这类歌曲的播放量复合增长率达191%。

现在的中文说唱，少了对金钱名利场的盲目崇拜，增添了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说唱歌手开始思考，卸下凶悍的伪装，不再局限于金钱和物欲，而是放眼社会，用自己的歌曲去关心世界。如于贞的《她和她和她》塑造了护士、翻译、律师三个女孩的形象，体现对女性的理解和鼓励，引发广泛共鸣。

此外，得益于说唱艺术本身的包容性，万物皆可说唱，也为其本土化改造留下了富足的空间。在最近播出的《中国说唱巅峰对决》

中，艾热穿着维吾尔族服装跳着民族舞蹈，给观众带来了充满民族风情的《千里万里》；万妮达用闽南话演唱的《莫加戴》在伴奏中加入了非洲鼓点。脱胎于自由多元的说唱文化来到中国，正在不断演变和拓宽其说唱形式和表达方式。囊括了意识说唱、G-funk、东北说唱、硬核说唱、爵士说唱、另类说唱等流派门类的中文说唱，打开了乐迷的新世界之门。在底层逻辑上，说唱用它强大的包容性把不同的音乐类型结合到一起，形成全新的风格，它既可以表达狂热的、愤怒的、浪漫、愉悦的情绪，又可以融合摇滚、国风、电子、抒情等不同的曲风。

除了不断开发说唱文本的深度，提升表达的力度与质感，城市符号也开始融入说唱创作，典型代表如TangoZ《这里是杭州(Love Paradise)》、Jony J《My city 南京》、Key.L刘聪《长沙Hood》等，中国说唱音乐人以rap的节奏生动描绘出了一幅幅城市画卷。

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中文说唱，在近几年的探索中，答案越来越清晰，那就是用说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褪去简单标签、回到地表的中文说唱，才能找到其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力。

文化视点 年轻观众为何偏爱纪录片

据人民日报，人文纪录片《人生第二次》近日火了，没有明星加盟、没有豪华制作，看起来平平淡淡，却在全网播放量超6亿次。观众何以如此喜爱？首先是作品质量过硬，其次也缘于当下青年观众对纪录片这种艺术形式的偏爱。

近年来，纪录片创作蓬勃兴盛，好评不断。其艺术魅力来自何处？真实是最震撼人心的力量。人们常说“生活比小说更精彩”，足见真实的动人。但纪录片不只是真实生活的“搬运工”，选择记录什么样的真实，在记录过程中是否保持了对周遭世界的敬畏和对被拍摄者的尊重，无不传递出创作者的认识和思考。这才是纪录片更有价值的部分。

熟悉的事物天然让人亲近、容易共情，陌生的事物可以激起好奇心、求知欲。这恰是纪录片擅长的领域。人文类纪录片对日常生活的呈现，科普类纪录片对新领域的介绍，都是典型。其次佼佼者还能将两者“融合调配”，做到陌生中有熟悉、熟悉中有新知。

不过，相较科普类纪录片而言，当下令人眼前一亮的人文类纪录片并不多见。这类选题的确不易操作。社会人生如此丰富多元，想要求全难免流于空泛，不动动人，专注于特例则可能陷于琐碎，难以反映生活的普遍面貌。要挖掘提炼出有价值的主题，需要敏锐的观察、深刻的反思、清晰的洞见以及高超的镜头语言。

数字滤镜：莫让修饰变修改

据光明日报，当滤镜审美成为一种范式，其影响力就不仅局限于社交媒体，而开始扩展至影像领域，尤其是网络影像的生产。近年来，随着网络影视剧的蓬勃发展，一些作品中对于滤镜的过度使用，却让修饰变成了修改，从而使对美的追求从真实走向了虚假。

艺术是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微妙平衡，追求美也是人类自跨入文明门槛以来延续至今的问题。对于传统影视剧创作如此，对于网络影视创作依然如此，过度追求完美，反而会导致审美脱离真实。滤镜不是万能的修改器，过度依赖滤镜不仅会导致美的变形，还会让前期拍摄产生依赖艺术的兴起。而数字时代的来临，又让这个问题再次浮现。如何对待真实，是数字时代不得不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

但无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数字修改都不等同于随意、任性，审美也有健康与畸形之分。我们倡导健康文化风尚，摒弃畸形审美倾向，抵制“唯颜值”的畸形文化。新时代需要健康的审美观，网络影视作为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引导审美的职责，不可偏离了真实性和人民性。

“动辄几十亿的网剧播放量”该收场了

据中国青年报，网剧上线，一天就斩获数亿播放量？这样的“神话”，以后可能不多见了。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将网络剧片、经纪机构、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等纳入管理规范，“网上网下一个标准、一体管理”；不得对节目的内容主题、制作成本、收视率点击率等进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和欺骗。

“网生”已成为中国影视的新坐标，互联网思维正在重塑着影视行业的传统格局。然而，在创造一系列奇迹与惊喜的同时，某些“网生”剧不仅继承了收视率造假这样的沉疴痼疾，而且将其演绎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编剧汪海林曾吐槽，某网剧点击量超400亿次，“全球哺乳动物加起来都不够用”。

当不少人津津乐道于“网生”内容正在成为新“风口”的时候，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是，因为缺乏有效管理，网络剧片正在成为数据造假的“重灾区”。近年来，“网生”剧动辄宣称点击率破百亿，实则暗藏着各种“注水”玄机，催生出一剧播放量、刷互动的黑色产业链。云山雾罩的数据造假，除了营造出一派自欺欺人的“数字繁荣”之外，还炮制出大量粗制滥造的“视听垃圾”。更为严重的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环境，本身就是对优质内容的挤压和打压。

探索网络文学 出海精品化新路径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网络文学经历20余年蓬勃发展，已成为影响世界的文化现象。数据显示，中国网络文学共向海外传播作品1万余部，覆盖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国际传播成效显著。如何深化网络文学海外传播，完成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嬗变，需要在拓宽内容题材、提升翻译质量、实现精准推介上持续发力。

在传播内容方面，优质内容生产是网络文学“走出去”的核心驱动。探索网络文学出海精品化新路径，一方面要根植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反映人民关切；另一方面，要根植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故事性和“网感”，打通海外读者的“快感通道”，力争叫好又叫座。

在传播效果方面，强化翻译环节为网络文学“走出去”补齐短板。在传播形态方面，建设面向全球文化产业的新业态，就要加强与海外产业方合作，利用海外优质传播资源拓展网络文学海外市场的受众触达面。同时，利用数字媒体带来的技术红利进行网络文学跨媒介产品的精准投放，因地制宜深化网络文学对外传播。不断细化海外产业链布局，也将使本地化的海外运营模式愈加成熟。

（□记者 刘一颖 实习生 曹宁 整理）